

廉政文化建设中的榜样作用及其实现

李蕊

(1. 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河南信阳 464000; 2. 中共中央党校马理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廉政榜样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具有承载培育、传递践行廉政文化的作用。但是当前廉政榜样教育中存在着负面典型过多而正面榜样较少、正面榜样自身存在认同困境以及廉政榜样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结合不够等不足,制约了上述作用的实现。针对这些制约因素,需要在廉政榜样教育领域内部做到“两个注重”、在廉政榜样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之间做到“三个结合”。

关键词: 廉政榜样; 廉政文化建设; 作用实现

中图分类号: D630.9 **文献标志码:** A

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和部门多发易发,危害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针对这一状况,我党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从群众路线教育的深入发展到“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重拳出击,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反腐倡廉方面表现出了极大决心,也在治标和治本层面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绩。

反腐倡廉的深入开展和实效取得,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刚性的廉政制度和机制,如:“不敢腐”的廉政惩戒机制、“不能腐”的廉政制约机制、“不必腐”的廉政保障机制等。但是“没有哪个政治制度能够完全抵抗腐败”^[1],除了上述外在刚性的制度手段之外,反腐倡廉也需要一些内在的、柔性的文化手段,营造出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从而达到“不想腐”的持久效果。廉政文化建设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形式,本文试图探讨的正是榜样载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功能作用及其实现问题。

一、廉政榜样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形式

自古以来的德育理论和实践,都特别重视研究和发挥榜样对于个人的示范引导和熏陶教化功能,

而从更为宏观的社会视角去看,榜样也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功能。同样地,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廉政榜样也具有独特的功能作用。

(一)历史回顾:各个时期的廉政榜样构成了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

回顾中国历史,各个时期都不缺乏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榜样形象,他们如同一个个鲜活的价值符号,串联起并生动表达了廉政文化的基本价值内涵。

先贤孔子曾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反观孔子一生也正是在示范着“内圣外王”、先“修身”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廉政之道。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弊端多多,但依然涌现了许多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的“清官”,如: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包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不畏君上、直言进谏的魏征等等。虽然囿于封建制度的局限,这些清官仍然难脱“青天大老爷”的特权身份设定,但是他们身上一致传递出了一心为民、廉洁奉公的价值追求,而这也正是今日廉政文化的基本价值内涵。

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更是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廉政楷模。革命战争时期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我党建立起了官兵一致、官民一致的廉政机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率先

垂范,引领这一时期的党员干部模范践行廉政要求,战斗中冲锋陷阵,生活中与军民同吃同住、深入群众,也正是因为一个个党员干部的榜样示范作用,使我党赢得了民心,夺取了革命的最终胜利;执政初期,党内同样涌现了很多身先士卒进行新中国建设的模范典型,如:“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还有“农业学大寨”中涌现的农民领袖陈永贵等;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社会风气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为了倡导社会正气,一批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廉政榜样陆续被推了出来,如: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杨善洲等等。

总之,无论是封建社会人们所传颂的一个个“青天大老爷”,还是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涌现的一批批好干部,他们的身上都体现着“为民、务实、清廉”的优秀品质,而这也串联起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基本价值内涵。

(二)现实分析:廉政榜样具有承载培育、传递践行廉政文化的独特作用

通过历史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各个历史时期的廉政榜样与传统廉政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样地,廉政榜样也是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形式,具有承载培育、传递践行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独特作用。

1. 廉政榜样对廉政文化的承载培育作用。文化是一个由器物 and 道法等多要素组成的大系统,居于核心的是其价值内涵,而榜样正是通过承载特定的廉政价值诉求,达到培育廉政文化之效的。廉政榜样作为廉政文化的载体形式,其承载培育作用是通过廉政榜样的选拔树立过程实现的,有学者在分析毛泽东时期我党廉洁从政的光荣经验时,指出其中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树立先进榜样,营造反腐氛围”^[3]。同样地,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培育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优秀党员干部典型,将廉政文化的价值诉求承载在榜样身上,不断丰富廉政文化的价值内涵,并且通过鲜明生动的榜样形象让公众清晰感知廉政文化的价值内涵。

2. 廉政榜样对廉政文化的传递践行作用。廉政榜样不仅可以承载廉政文化的价值内涵,也可以传递廉政文化的价值内涵,其廉政文化传递功能是通过宣传廉政榜样的过程实现的,在宣传过程中,不仅使公众接受了这些榜样,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把榜样身上的价值要求内化于公众之心。另外,廉政榜样树立、宣传之后的学习过程,是一个通过榜样引导公众特别是党员干部践行廉政文化内涵、将廉政文化

的价值要求“外化于行”的过程,因此廉政榜样也具有传递践行廉政文化的作用。

二、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中制约榜样作用发挥的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廉政榜样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形式,不仅可以发挥承载培育廉政文化的功能作用,而且还可以传递践行廉政文化。但是在当前的廉政文化建设和廉政榜样推宣过程中都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加上廉政文化建设和廉政榜样推宣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契合不够的问题,制约了上述作用的发挥。

(一)负面典型的震慑作用凸显,而正面榜样的引导作用显现不够

十八大后,党中央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勇气强力反腐,反腐败正在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据统计,截止2015年4月底,十八大以后全国已有超过100名的省、部和军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省部级以上69人(含:正国级1人、副国级3人、正省部级7人,其余为副省部级)、军级以上33人。^[4]这些负面典型每增加一个,对各级官员的震慑就增加一分,可以说正是在这些负面典型的震慑作用之下,反腐败工作在“不敢腐”的治标层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为进一步的“不能腐”、“不想腐”等治本措施推进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当前廉政负面典型震慑作用的如此凸显,廉政正面榜样的树立及其引导作用显现得还非常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廉政文化建设。原因有三:一是从榜样教育的内在规律来说,榜样教育主要应发挥正面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辅以反面典型的震慑警示作用,这才符合正面教育为主的基本方针;二是从社会心理来说,过多的负面典型而较少的正面榜样,容易让社会公众降低对党员干部群体的信心和信任感;三是从深层次的廉政成效上来看,负面典型的震慑警示促进了“不敢腐”治标成效的取得,但也容易滋生官员保守谨慎的“不作为”惰性心理,这同样不利于廉政建设。

(二)对廉政正面榜样存在着认同困境

毋庸置疑,要想让公众认同榜样身上承载和传递的价值内涵,首先必须使公众认同榜样形象本身。反观当前整个的榜样教育领域,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原来一呼百应的榜样教育形势早已不再,相反对榜样的疏离、质疑、消解等现象则随处可见,整个榜样教育陷入了普遍的认同困境,廉政榜样也不例外地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近年来虽然树立了一些廉政榜样人物,如:建国

初期的焦裕禄,改革开放以后的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杨善洲等。应该说,这些廉政榜样人物身上都体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特别是焦裕禄精神,习近平更是把它概况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无可否认,焦裕禄、孔繁森等也确实感动温暖了无数人民群众、引导激励了无数党员干部,但是时至今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曾经的感动变得稀薄,甚至化为质疑。而曾经的激励也从“走心”变为“过嘴”,有些党员干部为了迎合潮流以显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仅仅为了自己的政治升迁,表面上高调宣传廉政榜样而内心并不认同,更不可能在行为上自觉践行。正因为此,才会有很多“台上道貌岸然,台下蝇营狗苟”的“双面人”干部,极大地破坏了党员干部的整体形象。

(三)廉政榜样的推宣学习与廉政文化建设结合不够

制约廉政文化建设中榜样作用发挥的因素,除了廉政榜样教育自身存在的负面典型过多、正面榜样存在认同困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廉政榜样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契合不够。

第一,廉政榜样与廉政文化在内在精神层面的结合不够。廉政榜样要促进廉政文化建设,首要条件是他们要承载廉政文化的价值内涵,即:榜样身上体现的精神品质要与廉政文化的价值内涵相契合。从整体上来说,我们推出的党员干部榜样是符合廉政文化价值诉求的,基本上都体现着“为民、务实、清廉”的优秀品质。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有些地方或部门在选拔干部和推出干部典型时,还存在着过度注重政绩和才干而忽视廉政的倾向,从而使榜样背离了廉政文化建设的要求。

第二,廉政榜样与廉政文化在外在实践环节的結合不够。廉政榜样要促进廉政文化建设,还需要在宣传学习等外在实践环节与廉政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做到两者的良性互动,即:以廉政榜样的宣传推动廉政文化的传播,以廉政榜样的学习促进廉政文化的践行,同时以廉政文化的传播践行进一步加强对廉政榜样的宣传学习。但是现实中还存在两者的脱节现象,比如:有些部门和媒体在干部榜样的宣传中,习惯关注其突出业绩和宏伟事迹,而较少关注榜样身上的廉政精神;同时,传播廉政文化时又过度重视廉政理念的正面宣讲,而忽视了榜样形象的感染引导。

三、廉政文化建设中榜样作用实现的路径

上述制约因素,有的属于廉政榜样推宣内部的问题,如:正面榜样树立较少且公众认同度不高等,

需要在改善廉政榜样教育有效性上做出努力;有的则属于廉政榜样推宣与廉政文化建设之间的结合不够,需要在两者的互动提升上进行改进。

(一)在廉政榜样教育领域内部,做到“两个注重”

1. 在强化反面典型震慑作用的同时,注重正面榜样的引导作用。

“从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反腐的目的来说,廉政文化是强调扬善,而廉政制度是强调抑恶”^[5],可以说,廉政文化建设更应该注重对“善”(即廉政正能量)的弘扬。而在当前廉政榜样教育中,反面典型的震慑作用发挥过于充分,正面榜样的引导作用发挥得非常不够,这既不符合榜样教育的内在规律,又会在实践层面降低社会公众对官员的整体认知,也容易滋生官员保守谨慎的“不作为”惰性心理,整体来说是不利于廉政文化建设的。因此,在继续保持反腐倡廉高压态势,不断揪出“老虎”、“苍蝇”等反面典型并充分发挥其震慑作用的同时,也要多多发掘和宣传党员领导干部中的优秀典型,注重发挥正面榜样的引导激励作用。

2. 在重视正面榜样前期选树的同时,注重提升其后期的公众认同度。

正面榜样引导激励功效的发挥,不是仅仅把正面榜样选树出来即可,它更需要党员干部和公众能够认同这些正面榜样,只有这样才能认同他们身上体现的廉政文化价值内涵,才能自觉受其引导激励。当前廉政榜样认同困境的产生,原因非常复杂,既与廉政榜样选树宣传方式的不足有关,也与社会环境和人心的复杂多元有关。因此提升廉政榜样的公众认同度,需要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不断改进廉政榜样的选树宣传方式,如:适应社会环境的多元化,榜样的类型应该更加多样化;适应人们精神世界的现实化,榜样的形象应该更加人性化;适应公众主体意识的提升,榜样的产生应该加入公众的参与等等。^[6]另外,基于廉政榜样常常身涉权力中心、较易发生变质的特殊性,应当配套建立廉政榜样的约束监督机制,不能让正面榜样演变为负面典型,如果这样将会更加挫伤公众信任度。

(二)在廉政榜样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之间,做到“三个结合”

1. 把廉政榜样的选树与廉政文化的培育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的继承发展、是对封建主义“清官”文化的扬弃,它既应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共性,又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另外,当前的廉政文化既是我党保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同时它也应承载人民群众对于廉政的期待,体现出党性和人民性

的统一。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载体,我们选拔树立的廉政榜样也要有助于廉政文化的培育深化,即:廉政榜样的精神特征既要引领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要求,也要体现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的价值追求;廉政榜样的价值取向既要符合党的宗旨和利益,也要能体现人民群众的期待与厚望。

2. 把廉政榜样的宣传与廉政文化的传播结合起来。

传统媒体条件下的信息传播主要是“中心式”、“权威主导型”的模式,而随着互联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的不断更新和广泛应用,信息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互动性强、参与范围广等新的特征。在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态势下,无论是廉政榜样的宣传还是廉政文化的传播都要由“权威主导”转向“互动引导”,并且把廉政榜样和廉政文化的宣传传播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相互促进,即:在改进传统媒体传播手段的同时,更多运用微信平台等新的传播手段,通过这些受众可以参与其中的自媒体形式,把廉政榜样及其体现的廉政文化内涵植入人心;同时,宣传廉政榜样时既要关注其形象事迹,更要关注其精神特征,把廉政榜样的宣传与廉政文化价值内涵的传播合二为一。

3. 把廉政榜样的学习与廉政文化的践行结合起来。

廉政榜样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互动提升,终极效果应该是广大党员干部对廉政榜样的学习及对其承载廉政文化的践行。达到这一效果,首先离不开宣传教育部门的积极引导,如:通过宣传手段营造出一个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性官场氛围,通过教育手段引导社会公众明辨是非,传播廉政正能量;其次离不开行政管理制度的保障,如:通过完善廉政榜样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既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

争做廉政榜样为荣,又约束已成为廉政榜样的党员干部能够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不在荣誉中沾沾自喜,不在诱惑中堕落变质,维护廉政榜样的公众信任度。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廉政文化建设中,应该着力发挥廉政榜样的载体作用,通过改进廉政榜样教育自身问题及促进廉政榜样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的结合等途径,使廉政榜样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实现互动提升,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注入内在的柔性力量。

本文为“红色文化”专栏文章。“红色文化”专栏由浙江现代革命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和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稿,旨在通过红色文化研究,凝聚队伍,拓展空间,提升认识,同时深化红色文化资政育人,为文化强校强省强国建设作出学术努力。

参考文献:

- [1] 杜鲁门. 政治过程: 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M]. 陈尧,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568.
- [2] 杜道生. 论语新注新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07.
- [3] 邵景均. 毛泽东反腐败的基本经验及启示[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3, 17(6): 15-19.
- [4] 中国网. 十八大以来 102 名落马老虎名单: 省部级 69 人军级以上 33 人[EB/OL]. (2015-04-27) [2015-03-09]. <http://henan.china.com.cn/special/2015/0427/288309.shtml>.
- [5] 田湘波. 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关系辨析[J]. 廉政文化研究, 2012(4): 26-32.
- [6] 李蕊. 试论“榜样疏离”困境的产生与解决[J]. 求实, 2012(8): 79-81.

On the Role and Realization of Fine Examp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Culture

LI Rui

(1.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chool,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Maxism Theory Department, CCP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incorrupt government official model is 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clean government culture construction, which plays the role of cultivation, transmission and practic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incorrupt government official model is restrict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too much negative models and few positive models, identity dilemma of positive models, not enough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education of the incorrupt government official model and clean government culture construction. Aiming at these restrictive factors, “Two Emphasis” in the field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incorrupt government official model and “Thre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education of the incorrupt government official model and clean government cultur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realized.

Key words: incorrupt government official model; clean government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realization

(责任编辑: 任中峰)